

这是中国人熟悉却又常常误解的一段近代史！

洪秀全的文才有多高？他有代笔吗？他是恋童癖？……

太多问题我们特想知道，而历史学者又语焉不详——《说天国》三部曲将告诉我们清晰的历史细节。

说天国

洪秀全真相

陶短房



关于太平天国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作品

关于太平天国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作品

说天国

洪秀全真相

陶短房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天国:洪秀全真相/陶短房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6
ISBN 978-7-101-11719-6

I.说… II.陶… III.太平天国革命-文集 IV.K254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2104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说天国:洪秀全真相 |
| 著 者 | 陶短房 |
| 责任编辑 | 徐卫东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
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9 $\frac{7}{8}$ 插页8 字数230千字 |
| 印 数 | 1-8000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1719-6 |
| 定 价 | 45.00元 |
-

第一部

- 洪秀全为什么要讨薪 / 2
金田起义前，洪秀全做了什么 / 8
洪秀全的“文才”有多高 / 14
洪秀全何时读的《劝世良言》 / 19
洪秀全什么时候变“长毛” / 24
洪秀全的“大志”变幻史 / 29
谁把洪秀全关进“小黑屋” / 34

第二部

- 洪秀全为何成“宅男” / 40
洪秀全为什么讨厌酒 / 45
洪秀全的武器有什么 / 50
天王竟是“恋童癖”？ / 56
洪秀全的美食观 / 62
洪秀全的“幸运色” / 67
洪秀全的“广东情结” / 72
洪秀全的“广西情结” / 76
洪秀全的“科举情结” / 83

- 洪秀全的“行省情结” / 88
- 洪秀全的“拜金主义” / 94
- 洪秀全的“送子情结” / 100
- 洪秀全的“主编”情结 / 105
- 洪秀全的灯谜情结 / 111
- 洪秀全的“都市相思病” / 117
- 洪记修身齐家术 / 123
- 洪记“心灵美偏方” / 129

第三部

- 洪秀全为何搞古怪的二主制 / 136
- “洪记掺水大法”始于何时 / 142
- “洪天下”的起源与实践 / 147
- 当天王女婿，什么滋味儿 / 152
- 天国版“只许州官放火” / 158
- 只赐名，不赐姓 / 163
- 为什么天王不连宗 / 169
- 洪记官名的复古与反潮流 / 175
- 洪秀全的“合力”与“散力” / 181
- 不得不“虚”的君王 / 187
- 洪秀全为啥要“兼职” / 193
- 洪秀全的“代笔”故事 / 200
- 给秘书们的天典工具书 / 206
- 洪秀全为何“看神下菜碟” / 212
- 天王兄弟知多少 / 219
- 流动的“小天堂” / 225

- 洪秀全“家”在何方 / 231
- 洪秀全的小气与大度 / 236
- “洋人情”的慷慨和吝啬 / 242
- 洪秀全何以冷淡法国人 / 248
- 洪天王的“杀人爱好” / 254
- 戏曲与歌谣的敌人 / 260
- “农民起义军”怎样对农民 / 266
- 君爱财，取有“道” / 272
- 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 / 279
- 天国的等级符号 / 285
- 洪秀全的“排座次”游戏 / 291
- 谁能用“太平钱” / 298
- 为什么天国没有宗庙 / 305

第一部

洪秀全为什么要讨薪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正统史学著作中通常认为，洪秀全在1843年开始信奉上帝，并和几位亲朋好友自行受洗，从此“走上了革命道路”。他们抛弃私塾中孔子牌位，放弃偶像崇拜，自行受洗，并打造、佩带“斩妖剑”，发誓“扫除魔鬼”，而这个“魔鬼”就是清廷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一刻起，洪秀全就不再是一个整天惦记着考中秀才，并进而步步高升、从此飞黄腾达的寻常农村小知识分子，而成为一个渴望改天换地、“自己开科举士”的革命领袖兼教主。

然而这种传统解释存在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硬伤：剔除十多年后洪秀全“开基立业”，在“革命履历”中人为添加的种种作料，不难看出其在这一时期遗留下的文字、事迹，几乎没有什么反政府色彩。1847年洪秀全、冯云山在紫荆山捣毁神像，被当地大户王作新兄弟追捕，许多传教文字被抄送官府，被捕的冯云山和幕后营救的洪秀全更多次引经据典加以辩护，但这些“反动罪证”却被清朝浔州知府顾元凯和桂平知县王烈鉴定为“西洋基督教文字”、“尚无悖逆字样”，冯也因此仅被以“无业游荡”的轻微罪名，判处“递解回原籍管束”，从而轻易脱困。此时洪、冯的确已在“密谋革命”，但许多理论文字仍沿用早期作品，尚无法被清吏看出“反意”；四年前这种“反意”即便不说没有，恐也只是深埋心中的“一闪念”，不会

大张旗鼓到处和人去说，更不会劝人造反。

不仅如此，各项史料中所记载的、洪秀全 1847 年第二次进入广西、并与冯云山重逢前所“点化”的信徒，除失去联系、自生自灭的冯云山外，几乎都没有进行什么“革命活动”：洪仁玕陪着去了趟教堂，但没几天就独自跑回老家，且很快就在私塾中恢复了孔子崇拜，甚至直到 1850 年，即金田起义爆发的前一年，他还去广州参加清朝科举并再次落榜；他的族兄洪仁正、洪仁球在 1844 年便跟着洪秀全信教，但被洪打发走后便跑去贵县六十里外的大圩投靠“做酒米生意”的亲戚做短工、放牛，直到五六年后金田团营期间才应召前往金田聚义，且据洪仁正供词，他赶赴金田的主要原因，是因“拜兄弟”被宋姓烧了房子，“拜兄弟”是两广俚语，意即参加天地会，洪仁正等人被迫害，很可能和天地会起事，及当时席卷广西的“来土之争”有关；最早和洪秀全佩带斩妖剑的信徒李敬芳根本未参加“革命活动”，他和他的儿子后来据说都成了巴色教會的传教士；此外，《太平天日》中提到的五马岭彭参平等三人，冯瑞嵩、冯瑞珍兄弟，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中记载的苗区江老师、清远李姓等早期信徒，后来均未有“参加革命活动”的痕迹，甚至也无迹象表示，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在后期曾试图联络过这些“老革命”。如果洪秀全 1843 年就“密谋革命”，那么他花费几年时间所建立的，竟是一个绝大多数成员不知“革命”为何物的组织，也未免太可笑、太令人匪夷所思了。

王庆成先生在《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发展》一文中率先提出，洪秀全的思想经历过重大转折，其“造反意识”的明确滋生，是在 1847 年 8 月第二次进入广西、并会晤已建立“拜上帝会”的冯云山后；此前他是个信奉上帝但基督教知识贫乏、且在《劝世良言》启发和中国传统经史子集默示下，坚信这个“上帝”就是四书五经中

早有记载、中国“土产”的“皇上帝”，并因为自己在1837年丁酉所作的“异梦”，坚信自己背负“皇上帝”所赋予的神圣、特殊使命，要拯救中国人灵魂的虔诚宗教信徒，其一切所作所为，包括传教行为和著述，都是为传教理想服务的。这种见解近年来得到海内外不少学者的认同，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

然而这一“新定论”同样有硬伤：既然信仰是这样虔诚，传教是这样神圣，那么他便理应珍惜任何提升“传教境界”、增加“信仰知识”的机会，既然如此，当这样一个大好机会降临之际，他为什么要向教堂索要工资呢？

综合各方记载，1847年3月，在写信自荐后，洪秀全、洪仁玕来到广州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“粤东施蘸圣会”教堂，跟随美国籍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。

洪仁玕仅待了几天就回到老家，继续自己的塾师生涯，而洪秀全却在教堂一待三个半月，一边学习，一边传教，并赢得罗孝全的称赞和好感，答应为之受洗，并接受其正式留在教堂工作的请求。但就在一切似乎很顺利、很圆满的当口，洪秀全却在受洗典礼上为自己“维权”，要求“正当劳动所得”——罗孝全得给他发工资。

倘若洪秀全此时宗教信仰真的虔诚、坚定，面对如此好的“深造机会”，他理应喜出望外地接受，并兴高采烈地承担起“义工”的光荣使命，而不会急不可耐地“维权”（何况罗孝全也没说不给），作出在受洗典礼上要银元（罗孝全教堂雇员月薪8块银元）的难看举动来。尽管洪仁玕解释称，洪秀全是受了嫉贤妒能的教堂助理黄爱和黄乾的欺骗、误导，但他若本身不在乎工资，只在乎“信仰”，二黄又如何欺骗，如何误导？

更难以自圆其说的是，此前洪秀全为了坚持宗教信仰，宁可丢掉塾师工作，丧失收入来源，也要拒绝偶像崇拜，甚至不惜离家出

走——一个信仰虔诚的人，怎么可能既为信仰而不惜放弃饭碗，又为饭碗而不惜放弃信仰？

答案恐怕只有一个：洪秀全的第一次传教之行，目的并不是单纯的“精神之旅”，而同时带有“物质目的”。

尽管 1844 年春开始传教之行的洪秀全并非“造反者”，而只是个“自带干粮传教者”，但由于清廷仍从法律上严禁中国人信仰基督教，更严禁在中国人中的任何传教行为，他们的传教活动，依然是一种危险的“异端”行为。他们的路线，是从广州、顺德等繁华地区兜了个大圈子，转而循南海、番禺、增城、从化、清远、英德、涵江、阳山、连山，进入两广交界的苗族、瑶族聚居山区，走的是一条“越走越穷、越走越偏远”的路，特点是人烟渐渐稀少，对“西洋教”的了解也越来越贫乏。

照情理说，既然此刻的洪秀全不想造反，只想传教，那理应和《劝世良言》作者梁发等其他中国基督徒一样，选择城市、人烟稠密区和“见过世面”的沿海地带，一来人多方便传教，二来这些地方的人对“西洋教”接触多，免疫力较强，较不易大惊小怪，传教抵触情绪低，也较不容易出危险。作为基督教的初学乍练者，选择一条自讨苦吃的道路，是匪夷所思的。

从留下的记载线索中可知，尽管困难，但洪秀全每到一处收徒并不少，且其传教和继续旅行的费用，多来自这些教徒的资助。几名追随者系在人烟稀少、传教收徒不便的山区离去，洪秀全本人也是在发现瑶山语言不通、人烟稀少、传教困难后，认定“不若去广西”，而前往贵县赐谷村表亲王家。到王家后，发现“表兄家贫”、“甚难过意”，且“长久供应如许宾客实为不易”，与冯云山等发生口角，并最终导致这一“传教团体”的解散。

尽管闪烁其词，但洪、冯等进入广西，盘缠系信徒江老师等资

助；在贵县传教，“如许宾客”（应指自己和核心信徒）要由已信教的表兄一家等“长久供应”，这些都说明了洪秀全第一次传教的经济目的：这不仅是一种信仰，也同时是一种谋生手段。

清季秘密宗教和会道门采用收徒、传教方式敛财是常态，白莲教、天理教、香花教、八卦教等无不如此，且其往往采用避开繁华、挺进蛮荒的手法，以便在传教手法较稚嫩、信仰理论较单薄的条件下，获得更多的传教利益。白莲教的若干支派在贵州、湘西苗族地区的传播，以及若干更小教门在两广山区的传播，都具有这些特色。这对当时的两广沿海社会而言，并不陌生。

从目前保留下的《天兄圣旨》等资料可知，上帝会时期以及此后金田起义筹备阶段，洪秀全已蓄养多名妻妾，过着供养生活，其经济来源为接受信徒“纳贡”；进贡的并非如某些史论所言，仅系“革命所需物资”，而包括金银、珍珠等贵重物品，甚至帽子之类杂物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进贡者家境不佳，进贡却倾其所有，以至于连萧朝贵都看不过去，假托基督，要求洪秀全适可而止。这虽然是几年后的事，但凡事皆有缘起，从这些记载和井井有条的“圣库”等制度，都不难推断，早期洪秀全“纯传教时代”，也同样是依靠“纳贡”生活的，只是当时影响力太小，因而“收入”有限，不足以自肥罢了。

正因传教纳贡所得有限，洪秀全的传教团队才无疾而终，其成员各自汲取教训，有的重归正常生计，认定做工、教书比传教更“来钱”（包括洪仁正等，甚至还有洪仁玕），有的认定地点、方式选择不对，开始另辟蹊径，如转入紫荆山区、建立上帝会并开始“真造反”的冯云山，而洪秀全则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宗教修养和说服力有限，开始回家“修炼”，并寻找“深造”机会，另一方面也不放弃更好、更稳定的经济来源途径：8块银元不是小数目，且可一边挣

钱，一边“充电”，洪秀全当然急不可耐地要力争，而不顾“吃相难看”了——事实上，在此前后他已半推半就地恢复了塾师生涯，尽管洪仁玕曲为之讳，但很显然，他若不恢复或至少默认孔子崇拜，这份“旧工作”在对他再熟悉不过的家乡一带，是绝拿不回来的；与之相比，和“洋和尚”当众计较一份月薪，又算得什么？

金田起义前，洪秀全做了什么

1847年7月，原本有希望成为一名职业传教士的洪秀全，因在洗礼现场索要工资，被“洋先生”——美国传教士罗孝全“延期转正”，快快回了原籍。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因冯云山家属不断上门寻人，加上仍想到广西再碰碰运气，遂于7月21日从广州动身西行。一路坎坷，被劫匪抢走宝剑、路费后，在好心人资助下走了一个月，8月20日抵达贵县赐谷村，也就是上次入广西时落脚的表哥王盛均家。在这里意外得知，冯云山不仅就在广西，而且在不远的紫荆山区建立了一个人数多达数千、影响力遍及周边数州县的“拜上帝会”——最让他高兴的，是这个会不光拜上帝，也拜一个叫“洪先生”的超人，而这个“洪先生”似乎就是他洪秀全。

8月25日，洪秀全由表侄王为正带路，动身前往紫荆山区寻访冯云山，两天后在武宣东乡与冯云山碰面。他们见面谈了什么，不得而知，但自此后，洪秀全的志向，已经从做传教士、做教主，变成了做教主兼帝王，他的身份也从上帝的信徒兼仆人，悄悄变成上帝和耶稣的近亲，乃至血亲。

问题是，从1847年8月洪、冯相见，到1850年11月上帝会在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打响“迎主之战”，杀死第一个朝廷命官——正九品的署巡检张镛，从而公开和清廷“一边一国”，期间长达3年零3

个月的时间，身为“革命领导人”的洪秀全，究竟做了些什么？

按照洪仁玕金田起义后在香港对西洋人的说辞，和他后来抵达太平天国秉政编纂的种种“革命回忆录”，洪秀全在这3年多时间里可谓日理万机，忙得不得了：为了弘扬上帝的精神，打破偶像崇拜，在桂平、贵县、象州、平南等地到处砸庙宇、毁神像；为了争取当地英雄好汉的归附不遗余力，不但效仿古人礼贤下士，还发挥本人医学特长，帮助当地人抵御了1849—1850年的特大瘟疫袭扰，树立了上帝教的公信力；还在1850年夏天广西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爆发“来土争斗”前以“明慧的眼光”、“早见及此”，为上帝会制订了以放弃偶像崇拜、改信上帝教、接受“十天条”约束为条件，欢迎、庇护战败的客家人这一重要方略，从而在起义前夕获得了大量生力军——一言以蔽之，“没有洪教主，就没有新天国”。

然而仔细阅读保存下来的资料，就会发现这些“洪仁玕口径”破绽百出，水分十足。

按照洪仁玕的说法，1847年8月27日，也就是洪、冯见面当天，洪秀全就由王为正捧着砚台陪同，砸了武宣东乡的“九妖庙”，并在墙上题诗传教。然而《太平天日》上记载此诗全文，为“朕在高天作天王，尔等在地为妖怪；迷惑上帝子女心，腆然敢受人崇拜。上帝差朕降凡间，妖魔诡计今何在？朕统天军不容情，尔等妖魔须走快”，且不说“朕”、“天王”这样的词句题在公共场合，形同自寻死路，洪秀全是先进庙、后见的冯云山，而他的“立国大志”，则应是在会晤冯之后才“彻底坚定”下来的，这会儿自己还不明白这“革命大道理”，又怎能“教育广大人民”？

洪、冯见面后，在紫荆山内外捣毁诸多庙宇、神像确有其事，把他们告到衙门，并带领团练捉拿冯云山的桂平秀才王大作、王作新兄弟，就在呈文中说他们“业经两载，迷惑乡民……胆敢将左右

两水社稷神明践踏、香炉破碎”，但在呈文中提到的“主犯”是冯云山，“从犯”是曾亚孙、卢六，“窝匪”即包庇犯是当地士绅曾玉珍一家，惟独只字未提“首犯”洪秀全。更有甚者，根据现有清方文书、战报，直到金田起义爆发后，清方才知有洪秀全这号人物，而确知洪秀全是这股“教匪”的“首逆”，已是1852年太平天国进入永安州城很久后的事；直到太平军进了南京大半年，清方才总算弄清，洪秀全是真有这么个人还是捏名伪托，是仍然活着，还是早已死了，像谣传中所言那样，被人刻了个木偶顶缸。很显然，倘洪秀全如洪仁玕所渲染的，在这段“革命准备期”十分活跃，到处留名、公然活动，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出现，就算清吏颛预不熟悉情况，王氏兄弟就是紫荆山中的客家大族，住在离洪、冯最初落脚的大冲村不远的石人村，洪秀全哪怕稍有积极表现，也不至于连“黑名单”都上不去。

“给人看病”的说法似乎不无影子，不甚靠谱的半窝居士《粤寇起事纪实》说洪秀全治好韦昌辉妻子的病，从而赢得后者一家信任，而民国时简又文先生访问洪氏后人，也证实洪氏一族颇多通晓医理者。但在这三年多时间里，洪秀全深居简出，真正接触到的人很少，只限于自家亲戚洪、王、赖姓，以及少数上帝会核心首领，一般首领且只知道有个“二兄”、“三星兄”，普通会众更“只知道有洪先生而已”，他的医术怕也惠及有限，更不可能帮助几万会众抵御瘟疫侵袭。

至于预见“来土争斗”，制订明智战略，则更无从说起：自1848年9月间，杨秀清、萧朝贵相继假借天父、天兄下凡，成为“通天人物”后，便以洪秀全“亲爹”、“亲哥哥”身份严加管束，攘夺了决策大权，洪秀全自己承认，“天下万郭（国）都靠秀清、朝贵二人”，自己“算是无用”，萧朝贵更讥讽他连“手指甲事”都不敢

擅自做主，他能在哪儿住，不能在哪儿住，几时搬家，白天走还是夜里走，都要由杨秀清、萧朝贵决断。《天兄圣旨》中记载，有个叫谢享礼的只犯了“乱言”的小错，洪秀全都不敢擅自处分，要禀告“天兄”发号施令。不仅如此，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二月二十八日谢享礼被“天兄”重责一千，“跪石至旦”，三月初四“天兄”还不放心，要再“下凡”一次“复核”。可想而知，远比打一个乱说话分子屁股重大得多的事项，洪秀全能有多少决断权，乃至话语权。

从《天兄圣旨》中记载可知，洪秀全在此期间，除了曾在1848年夏至1849年2月间返回广东，试图通过罗孝全等人关系，营救因和王氏兄弟对簿公堂，而长期羁押在桂平县监狱的冯云山外，其余时间大多在杨、萧支派下，隐姓埋名、藏匿行踪，到处“避吉（避凶的掩饰词）”，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桂平县金田村、鹏隘山高坑冲，贵县那邦村、旧合村，平南花洲山人村等，甚至金田团营早已开始，大本营早在金田村设立，洪、冯还在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藏着，结果差点“闹出人命”。

之所以如此，一方面，杨、萧专权，洪秀全没有太多“日常工作”可做，没必要“跟随大部队行动”；另一方面，洪秀全此时已经自称上帝次子、耶稣亲弟，并暗中自称“太平王”，隐藏既可进一步让自己神秘化，以提高教主对这个靠宗教凝聚起来的团体的号召力，也对自身安全有好处——尤其当起义前夕，他的众多家属被从花县老家接来团聚，而他本人又在教众中选拔了许多“娘娘”后，这点就更为重要。

当然，频繁更换住址在客观上对起义组织也有帮助。杨、萧借他这个“太平王”的神圣地位，对核心首领封官许愿，用“打江山作功臣”的期权刺激这些人“立志顶天真忠报国”。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，萧朝贵想诱捕、清洗象州和他唱反调的李某，就让会